

中国熟人社会的“类社会资本”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社会资本储量的考究

王尚银 康志亮

(温州大学 法政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 近年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与熟人社会的研究中, 多将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等传统要素界定为社会资本, 甚至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混同使用, 从而造成熟人社会社会资本存量测评的混乱和结论的失真。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探究, 对社会资本理论发展脉络的考察以及对有关熟人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尝试提出了“类社会资本”这一“模糊”概念。经过重新审视, “类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熟人社会, 并且储量很高。“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类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 熟人社会; 存量; 储量

中图分类号: C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2) 01-0165-06

在关于中国社会资本存量高或低的讨论中, 大多数学者认同中国社会资本存量较低、不足或欠缺。但在具体的讨论中, 研究者给出的答案却不尽相同。如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网络、“人情”等熟人社会元素是否属于社会资本, 至今仍存在争议。鉴于理论与实践所显示的社会资本的普世价值, 以及熟人社会“关系”等传统元素对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 我们必须深入理解社会资本理论的内涵与旨意, 深入考察熟人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辨清熟人社会的“关系”等传统元素与社会资本是否契合或在多大程度上匹配, 熟人社会的“关系”等传统元素是否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所助益, 从而客观地解读熟人社会, 清晰地考察中国的社会资本存量。

一、关于社会资本概念与社会资本存量的认识

在社会资本理论短暂的发展历程中, 随研究视角和回应问题的转换, 人们对其概念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由此造成了考察同一研究对象而结论却相去甚远的后果。

最早对社会资本作出明确界定的是布尔迪厄。他认为,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这些资源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① 虽然布尔迪厄没有对社会资本进行深入研究, 但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研究视角被后来的研究者继承和发展, 如伯特的“结构洞”相关理论,^② 波茨的社会资本嵌入说^③ 等, 所以若研究社会资本存量, 社会关系网络无疑是重要的考量指标。科尔曼较为全面具体地研究了社会资本, 他主要根据社会功能来界定社会资本。^④ 由于功能的外现受多种因素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 (2010Z45)。

作者简介: 王尚银,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学理论; 康志亮,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研究生, 专业方向: 社会学理论。

①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 包亚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② 罗纳德·伯特 《结构洞: 竞争的结构》, 任敏等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③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1998.

④ 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 邓方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年。

影响,从某一项功能出发必然顾此失彼,欲全面考量所有功能则无法穷尽,仅从功能维度很难达到社会资本的本质,所以这种界定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但科尔曼提出的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对于考量社会资本存量仍有借鉴价值。将社会资本引入经济学、政治学领域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而其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是“社会组织的特征”。^①这一界定方法依然有功能视角的痕迹,但它直接体现着社会资本存量考量的指标,即信任、规范与网络。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人力资本为研究视角,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②。

从以上学者的观点看,虽然研究立场和界定视角有所差异,但不难发现其中的交集。首先,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无论是嵌入,还是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都是其他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源赖以寄生和增值的载体,这也是测量社会资本的基准指标,至于网络的密度、结点、规模等则是研究者对关系网络这一指标的细化。其次,信任、互惠、规范等是社会资本的形式表征。其中的规范、制度等是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力量,信任、互惠等则是对实然社会现象的总结,这些内容本身就反映着社会资本的现存量,是社会资本存量测量的重要指标。再次,从社会资本的运行主体或社会资本存量的考察对象上看,它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可以是某一社会组织,也可以是整个国家。由于所考察社会资本存量的运行主体不同,其考量方法也会有差别。此外,作为一种不同于物质资本的无形资产表现形式,社会资本有着与其他类型的资本一样的共同属性,即具有生产性,需要通过投资获取增值回报。总之,社会关系网络、维系关系网络的规范制度以及社会的信任互惠等现实效益状况构成了衡量社会资本是否存在、社会资本存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但仅以这些标准直接应用于熟人社会仍然不尽科学,还要进一步对社会资本与熟人社会进行由表及里的深入追问。

二、“类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

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根基,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无论是在中华民族还是在西方世界,都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但转型期仍属“熟人性质”的中国与社会资本缘起的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制度环境和社会现实,中西方的差异决定了社会资本概念框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维系关系网络的规范制度等与熟人社会中对应的“关系”、网络、“人情”等传统元素的差别。

第一,从社会资本理论的缘起来看。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既是对20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理性反应,又是对西方发达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在社会现实方面,西方世界积累了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和经济成果,是社会资本理论产生的经济背景和物质基础;经历数百年转型,公民社会快速成长与政治国家逐渐消退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较为成熟的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规范等,是社会资本理论产生的政治背景和制度环境;二战前后的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先后宣告自由市场和政府计划的失灵,同时战争和经济危机也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各国政府纷纷走上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改革之路,这是社会资本理论产生的客观环境。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社会的视角最终指向经济的目标,在“政治国家”外谋求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民主法治、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等西方传统既是社会资本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也是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论基础,延续着思想文化传统和各门类学科的学术渊源。就社会资本而言,相对系统的

^① 罗伯特·普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经济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符号互动论、人际交换论等都构成了其直接的理论来源。

表面上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骤然转型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问题复杂交织的局面似乎与社会资本理论产生的现实环境较为相似,社会各界也在探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但进一步窥探中国的现实与传统发现,仍旧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尚不具备孕育社会资本理论的深厚经济基础,处于发展变革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和规范方面有着较大的不稳定性,还有待健全完善;政治制度领域同样进行着渐进式的改革,而始终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决定了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不同;思想文化领域,虽然现代中国社会科学是在继承、借鉴中西方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之根,仅有短暂历史的社会资本理论是有着较早分科历史的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产物;此外中国城市文明与公民意识并未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突飞猛进,乡土文明依然兴盛。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孕育出天然的社会资本,急需社会资本理论指引的转型期中国也缺乏繁育社会资本的肥沃土壤,社会资本的理论要求与熟人社会的现实表征名实不符。

第二,从社会关系网络及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规范制度来看。如果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抽象为先在型关系和后建型关系(先在型的关系是指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后建型关系是人们为某种利益而有意识建立的、并有相对健全制度和规范作保障的各种关系),显然这两种关系在中国和西方都普遍存在,而发迹于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指向的却仅是后建型的关系,人治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先在型关系为基础,然后是对先在型的关系延续和维持以及少量的后建型关系。在商业气息浓重的西方世界,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目的是明确的,即为获取收益与回报(且多是物质上的回报),个体或团体主动而有选择地进行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投资;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是先于人而客观存在的,即使欲扩大社会关系和网络也必须以此为前提,对此主体是不可选择的,只能依原有经验被动地延续和维持,其延续和维持的结果除了不确定的物质上的增值外,更多的是非物质上的回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熟人社会中的中国人也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稀缺资源,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体在既有制度之外但得到既有制度认可的范围内获取稀缺资源,中国主体的手段是“钻”既有制度的空位但却得不到既有制度的承认,“即使无米也可炊”。

第三,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运行方面。依社会资本理论,从横向社会关系上来看,社会关系及其中蕴藏的社会资源对关系网内的个体是公平的,具有公共性;从纵向上看,社会资本的投资与收益尊奉“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是不可转让的,有着西方特有的私有性和个人主义色彩。总体来看,后建型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的运行和维系有相对健全的法理和契约性质的规范制度作保障,其投资与收益的周期较短,但并不排除其有一定的风险性,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可轻易断裂或取消。在中国传统社会,从横向社会关系上来看,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中资源的获取都呈“差序格局”之势,是不平等的;从纵向上看,社会关系和网络的延续与维持及其中各种资源付出的收益与回报并非是即时的,投入与回报是不成比例的,与社会资本的不可转让相比,收益与回报可以随关系网络的延续和扩展而发生继承和转移。虽然熟人社会也存在后建型关系网络,但这种关系网络始终对先在型关系网络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并且维持这种关系网络运行的同样是非体制和非制度化的准则,即依靠的是“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纲常和民俗惯习,有着较强的稳定性,以致炎黄血脉传承数千年而经久不息。

归纳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人情”等元素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社会资本,所以,用西方的社会资本概念不能准确地描述、解释中国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源。但鉴于这些元素对中国历史与当代社会的深远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以理论的自觉扭转其一直以来的自然自发的运行发展态势,祛除其消极因素,强化其积极作用。然而,对于“关系”、网络、“人情”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维系规范这一内容庞杂、边界不清的熟人社会重要现实范畴,至今还没有一个

“理性”的概括，与其以一个不准确的现成理论对其进行简单评价，不如从“模糊理论”的视角开展相关推理和研究，从而避免因理论与现实的简单对照而造成研究框架混乱和应用结论失真，所以我们这里以“类社会资本”这一模糊概念来界定上述内容。

以“模糊理论”的研究视角，“类社会资本”是对熟人社会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横向与纵向的非体制性关系网络，以及维持保障关系网络运行并最终推动人与社会发展的种种传统非正式制度规范等要素的理论抽象。它至少有以下两个特征：（1）“类社会资本”具有“社会性”。“类社会资本”以先在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为基础，在农业生产、政治生活和较少的商业活动中承继、扩展并培育血缘、亲缘、地缘的关系网络，而先在型的血缘、亲缘、地缘的社会关系和网络遍及中国传统社会各处。（2）“类社会资本”具备“资本性”。资本是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一种生产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得剩余价值”^①，资本在不断的生产、交换的流通过程中实现保值增值，应用到社会资本中，它指的是能够带来增值的非物质力量。在熟人社会，社会关系和网络在维系与扩展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资源必然会换来高于此投入的回报，因为中国人不习惯“欠人情”，喜好礼尚往来，“滴水恩”可收获“涌泉报”。

三、熟人社会的“类社会资本”储量丰富

经过对社会资本理论和熟人社会的重重审视，仍属“熟人性质”的中国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渐渐清晰，从构成社会资本根基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看，法理型、契约性的关系网络逐渐增多，但与“类社会资本”的根基相比还相去甚远，“政治国家”外的关系网络在广阔的中国社会比重很小，密度不高，分布不均，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与之相比，由于“关系”、网络、“人情”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维系规范对中国历史与当代社会有着深远影响，熟人社会中有着丰厚的“类社会资本”储量。

首先，从“类社会资本”的建构基础来看，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密集交织。第一，“类社会资本”有足够强大的社会性。一方面受制于中国地理环境因素，在地域上，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天然地被分割于九州各地，另一方面自给自足且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劳动使得同宗同族不得不固定在某一地域范围内群体生产生活，这样的封闭性就形成了规模较小但数量较多的不同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同时深入人心的“同姓三分亲”、“一表三千里”、“五千年前是一家”、“远亲不如近邻”等民俗乡约又拉近了不同地域但同姓、不同宗族但同地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社会纵横关系网络。第二，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稳定而坚固。地域上的分割限制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规模，其封闭性也强制个体和群体不得不接受并维系天然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使得社会关系网络代代相传。同时封建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文化更加强化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其次，从“类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来看，“类社会资本”资源丰富。从“周礼”到礼制，从汉代儒学到宋明理学，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文明二千余年，渗透于熟人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在私人生活领域，人情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纽带，而人情关系的积累和维系是获得“信任”的前提，获取信任后即可达成“互惠”。如何积累和维系人情关系，其中依赖和遵循的原则也受儒家思想影响。例如忠信礼义孝悌廉耻不仅是道德标准，也是隐形的交往规范，而以和为贵、礼尚往来同样是约定俗成的非体制性关系法则。在公共生活领域，“天人合一”、“大一统”、“民贵君轻”等思想都曾是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理念与统治工具，“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0页。

有序、朋友有信”等伦理纲常保障着社会的稳定，从而造就了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这其中很多治理理念至今仍然在起作用，这就是国家社会资本中的“规范”。而即使在“重本抑末”的农业社会，尊奉“仁义礼智信”的明清商帮也收获了几百年“资本”繁荣的历史。不管是公共统治，还是私人交往，浸润着儒家思想文化的“类社会资本”中资源与要素都在持续不断地投入与付出中获得增值的效果。

最后，“类社会资本”推进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历史上储量丰富的“类社会资本”构成了现代化建设的丰厚储能，然处于急剧转型中的熟人社会，“类社会资本”存量的构成要素因时代变迁发生了新的变化。虽然部分“类社会资本”在新的环境中因自发变异而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各地域各类型“类社会资本”的成功转型使其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再生动力和特殊保障。在政治文化领域，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不渗透着“类社会资本”的资源与元素，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谐理念逐渐成了国家的治理理念，各地的传统民俗惯习也逐渐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各具特色的村规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类社会资本”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积极功能渐趋扩大。在社会经济领域，血缘、亲缘、地缘等先在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非但没有因由封闭转为开放而降低其效用，而且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和迅捷发达的交通通讯，逐渐升级扩展，遍布于华人世界的每个角落，如北京的“浙江村”、巴黎的“温州人”，这些先在型关系网络的改革创新增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初期，先在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本来源，特别是家族企业在起步发展阶段更多地受惠于传统“类社会资本”^①。

我们并不否定“类社会资本”的应然状态对转型期中国的消极影响，但绝不认同将转型期潜规则盛行、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拉帮结派等种种社会黑暗归因于熟人社会中的传统因素。处于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古与今、中与外、文明与糟粕机械地混融于一体，潜规则盛行等问题固然与传统人情关系（属于“类社会资本”）有关，但经济制度的漏洞势必造成经济上的腐败，政治改革的滞后则给官员失范留下了空间。历史学家黄仁宇考察了处于转型期的17世纪的英国后指出，拉关系走后门同样存在于英格兰的宫廷、政府与普通百姓之间。^②可以说这些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在某种程度上是转型期的特殊历史现象。总之，“类社会资本”非但不是上述问题的罪魁祸首，还是病态社会中的受害者之一，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制度的建构，需要社会资本的培育，也需要对“类社会资本”的承继、改革和创新。

“类社会资本”之所以被传承数千年，是因为“类社会资本”是世代中国人自觉的创造，是祖祖辈辈中国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时代虽有变迁但其合理性一直被历史所证明，即“类社会资本”能够给大多数人和社会带来好处，这正是熟人社会实然或已然状态的“类社会资本”存量。

四、研究“类社会资本”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类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熟人社会现实问题新的理论工具。本文是对“类社会资本”研究的初步尝试。“类社会资本”至今还是一个“模糊”的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还不完善，但正如前所述，与其直接应用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的“关系”、“网络”等资源开展无关痛痒的“是”“非”争论，我们不如尝试“模糊”研究的方法，也许在理论成熟和方法论完善的过程中能使研究有

^① 李路路的《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和石秀印的《中国企业家成功的社会网络基础》（《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中都表明配偶、亲戚、朋友等与私营企业主的最密切的社会关系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些社会网络基础都属于本文提出的“类社会资本”。

^②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页。

所突破。“类社会资本”理论正是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社会关系网络、主宰社会关系网络运行的主体行为、维系关系网络运行的非正式规则和制度以及其中蕴藏的文化要素等熟人社会资源的考察，而尝试建构的一种独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研究理念。作为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抽象，“类社会资本”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有着较强的适用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用舶来理论而造成的混乱与失准，增强社会科学研究的效能。

其次，“类社会资本”研究是在中国研究和应用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前提。“类社会资本”理论是在与社会资本的对立比较中抽象而最终确定的，虽然与社会资本的研究范畴有极大的相关性，但两者的区别毕竟是明显的。基于“关系”、“人情”等复杂熟人社会历史与现状而形成的一套区别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国本土理论，对于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既有从西方舶来的社会资本，也有中国自生的社会资本，同时实践证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社会资本的培育，中国既需要社会资本，也需要“类社会资本”，那么“类社会资本”理论的出现就为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空间。此外，虽然“类社会资本”理论是发迹于中国的本土理论，但这并不代表它只反映中国的特殊社会现象，如果剥离“类社会资本”中非正式规则和制度等中国独有的文化要素，其中的某些社会关系网络（如亲缘关系）和行为方式（如权力寻租）在国外其他国家也存在，并非为中国所特有，所以“类社会资本”理论对外也有一定的适用性。

最后，“类社会资本”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类社会资本”理论对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有强大的解释力。惠于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先在型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继续在纵向上延续，在横向上扩展，关系与网络交叉得更加密集而复杂，这就意味着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仍然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基础。同时儒家文化、民俗惯习等“类社会资本”构成要素依旧在华人世界根深蒂固，影响着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滞后的政治体制正在进行渐进式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健全完善，国家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力量有待加强，思想文化领域受全球化信息化消极影响严重，与传统中国数千年的超稳定政治与社会结构相比，各地区、各领域、各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此起彼伏，社会渐显不健康之状。与社会资本理论最终指向经济效能不同，中国熟人社会“类社会资本”的承继目标是个体的“小康”和集体的“大同”，转型的“类社会资本”理论最终必将导向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现实需要。

责任编辑：王永平